

PRIDE AND PREJUDICE

# 傲慢与偏见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奥斯丁/著

王科一/译





#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著  
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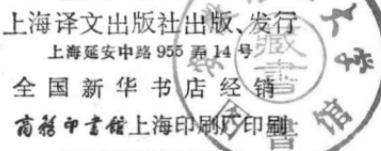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年版译出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著

王科一译



开本 850×1163 1/32 印张 16.75 插页 5 字数 283,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册

ISBN 7-5327-1760-7/I·1053

定价：16.9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作 者 像

I can return the compliment, by thanking you for the unexpected pleasure of your letter yesterday, & as I like unexpected pleasure it made me very happy; And indeed, you need not apologize for your letter in any respect, for it is all very fine, but not too fine. I hope to be writing again, or something like it. — I think Edward will ride & suffer much longer from heat, by the look of things this morning. I suspect the weather is coming into the balance. It has been hot here, as you may suppose, since it was so hot with you, but I have not suffered from it at all, nor felt it in such a degree as to make any one of us feel anything in the country. Everybody has talked of the heat, but I set it all down to London. — I give you joy of an new nephew, & hope if he ever comes to be hanged, it will not be till we are too old to care about it. — It is a great comfort to have it so safely & speedily over. The Miss Curlings must be hard worked in writing so many letters, but the novelty of it may recommend it to them; — One was from Miss Eliza, & she says that my Brother may arrive today. — In indeed, I am never too busy to think of S.S. I can no more forget it, than a mother can forget her sucking child. & I a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your enquires. I have had two sheets to correct, but the last only brings us to his first appearance. Mr R. writes in this most flattering manner that he must wait till May, but I dare scarcely a hope of its being out in June. — Henry does not say last st; he has now turned the printed, & says he will see how soon today. — It will not stand still during his absence.

奥斯丁手迹(致其姐卡珊德拉书片段)

·《傲慢与偏见》序言 汪谦奥主

## 《傲慢与偏见》序言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sup>①</sup>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性与感性》（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斐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描写。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sup>②</sup>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

“二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sup>③</sup>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sup>④</sup>

夏绿蒂·勃朗特曾说：“我可不愿意在她们的那些高雅而狭窄的房子里跟她（奥斯丁）的那些绅士淑女们呆在一起”。<sup>⑤</sup>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房子的确可能是窄的，人物活动的天地也可能比较狭小，但这能限制作者的视野吗？《傲慢与偏见》第九章中，达西说：“在乡下，你四周围的环境非常闭塞，很少变化。”伊丽莎白的回答显然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可是人本身变化那么多，你永远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新的东西。”<sup>⑥</sup>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以《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题。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感到不胜荣幸，“他赢一

① 转引自伊扬·瓦特编：《奥斯丁：批评文选》1963年美国版第15页。原为书评，发表于《民族》报1923年12月15日，收入论文集时本段被删去。

② 《书信》1814年9月9日。

③ 《书信》1816年12月16日。

④ 《书信》1816年4月1日。

⑤ 1848年1月28日给乔治·亨利·路易斯的信。

⑥ 《傲慢与偏见》第9章。

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sup>①</sup> 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要知道，柯林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主”，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至于威廉·卢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sup>②</sup>？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马喜剧。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念念不忘，却不乐于提及她们兄妹几个的财产是做生意赚来的”<sup>③</sup>。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起来的北部发家致富的，这样赚来的钱带着铜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又如关于拿破仑战争——奥斯丁在英国对法国作战期间笔下没有触及拿破仑战争，这是奥斯丁批评中一条经典性的

① 见本书第191页。

② 见本书第191页。

③ 见本书第17页。

论点了。<sup>①</sup>其实，暂时撇下《劝导》中关于海军的突出描写不说，就是以轻快幽默著称的《傲慢与偏见》第十二章中也还在谈笑风生中挟带着“一个士兵挨了鞭子”这种不协调的声音，提醒读者关于军队的存在。在《傲慢与偏见》中，驻扎在麦里屯的一个民兵自卫团成了班纳特家小女儿们“快乐与消遣的来源”。但我们不要忘记，民团之所以驻扎在英国南部，是为防备法军的登陆袭击，而那些年轻军官之所以能整天与当地的姑娘们跳舞调情，只因为他们防备的袭击始终没有到来。这就是民兵自卫团的军官韦翰与班纳特家的丽迪雅小姐私奔的背景。后来韦翰离开了民兵自卫团，在正规军中弄了个掌旗官的职务，并且奉调带着新婚的丽迪雅到了北部。从故事的编排来说，这样处理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韦翰在当地臭名昭著，自然希望改换环境。但是，“奉调北方”轻轻一笔又带出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北部工人的骚乱。正如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还没有正规警察，维持国内秩序、镇压民众骚乱的职能由军队来担当。因此在小说中，正当国家面临南部法军威胁的时候竟然还需调遣军队北上，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即为镇压北部的工人骚乱，主要是破坏机器运动。<sup>②</sup>夏绿蒂·勃朗特的《谢莉》中描写十九世纪初期破坏机器运动不就有军队出现吗？只有写于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小说《北部与南部》在关于当时工潮的描写中才涉及警察。看到这些，

① 有趣的是，奥斯丁在 1813 年 2 月 4 日致姐姐卡珊德拉信中曾自嘲地说《傲慢与偏见》一书过于“轻快、明亮、光耀夺目”，需要配上点严肃的内容以增加分量，譬如说，插入一段“关于波拿巴（系指拿破仑）的历史”。

② 大卫·莫那翰编：《简·奥斯丁与社会背景》，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1 年版，第 101 页。

我们怎能不钦佩奥斯丁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怎能不承认《傲慢与偏见》没有写历史事件，可是通篇字字句句不露痕迹地透露了历史社会的气息。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还不能仅仅在背景与个别细节上做文章。那终归是外围战。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归根结蒂，还得正面出击，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入手来说明问题。

英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在论《爱玛》的文章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爱玛》是关于婚姻的”。其实，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所有奥斯丁小说都是描写婚姻的，《傲慢与偏见》尤其如此。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原文中的 *in want of* 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戶，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保障，只能等着结婚。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这就难怪班纳特太太，象四邻八舍所有那

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把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sup>①</sup>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关键是有“财产”。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 also 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这里涉及妇女问题。的确，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没有财产而受过教育的妇女，除了结婚，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若要谋职，就只能去当家庭女教师，而奥斯丁在《爱玛》第三十五章中借一个人物之口感叹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简直还不如被贩到美洲去的黑奴！

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还不是探索妇女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爱玛》中另有一番话说：“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

① 见本书第2页。

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很明显，在奥斯丁看来，关键还是“财产”<sup>①</sup>二字。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sup>②</sup>；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认为达西“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纳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他说，在婚姻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我们在《傲慢与偏见》中，看到围绕着对婚姻关系的描写，

① 《爱玛》第10章。

② 见本书第143页。

浮在最表面的是会客、喝茶、跳舞、聊天儿等一个谈笑风生的社交世界。可是，另一方面，这里又是一个由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竞争的世界。我们看到，充斥全书的是数字，数字，数字。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镑的地产；班纳特太太嫁给他时有四千镑的嫁妆；班纳特家五位小姐每人结婚时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彬格莱有十万镑遗产，每年进款在四、五千镑左右；彬格莱小姐有两万镑嫁妆。达西先生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而他的妹妹乔治安娜有三万镑的嫁妆。韦翰与丽迪雅私奔以后，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镑才肯正式娶她。达西的表哥，费茨威廉上校是伯爵的小儿子，没有继承权，倘若结婚，女方至少得带给他五万镑作陪嫁。柯林斯牧师坦白地宣称，他“得制订什一税的条例，既要订得于自己有利，又要不侵犯施主的权益”。<sup>①</sup>当然，还有那个使班纳特太太无限愤慨的遗嘱“附加条款”！就是它决定了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命运，因此也才有了《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总之，在婚姻中，正如《诺桑觉修道院》中的人物说的，“不管那些传奇故事里怎么说，没有钱这东西是不行的”<sup>②</sup>。

当然，除了具体的金钱数字，还有由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地位；如班纳特家有些不体面的亲戚——姨夫在镇上当律师，舅舅在伦敦经商；就为这，彬格莱小姐耻笑她们，达西坦白地说：“倘若她们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那机会就大大减少了。”<sup>③</sup>

总之，是经济、是数字决定人们的生活与命运，决定着婚

① 见本书第 119 页。

② 《诺桑觉修道院》第 18 章。

③ 见本书第 42 页。

姻关系。要说对现实关系的揭露，这可算是入木三分了。难怪西方有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卫·戴克思说，在“揭露人类行为的经济原因”方面，简·奥斯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sup>①</sup>这固然是句俏皮话，但也不是没有几分真理的。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象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就以藐视奥斯丁的夏绿蒂·勃朗特为例，她的《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在感情上的翻腾无非是因为发现罗契斯特已婚，她本人只能作罗契斯特的情妇而得不到合法妻子的地位。若按某种分析“思想实质”的方法，我们也不妨说勃朗特在思想上还不能突破资产阶级婚姻神圣性的正统观念。至于简·爱后来与传教士圣·约翰·里佛斯的纠葛，则完全堕入感情至上主义的废话了。

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

<sup>①</sup> 转引自伊扬·瓦特编：《奥斯丁：批评文选》，1963年美国版，第11页。

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sup>①</sup>，“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sup>②</sup>。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乐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但问题不仅止于此。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以最高的速度完成这种标准化的婚姻关系，令人特别不舒服，为他们感到难堪。在奥斯丁笔下，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关键在于事情办得那样仓促，采取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形式。关于资产阶级婚姻，恩格斯曾说：“在每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sup>③</sup>

这种“自由选择”和“爱情的基础”需要一个过程，从相见、钟情、传情、求婚、订婚，直到最后结婚，这个过程象某种仪式，人们必须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不能“一蹴而就”，否则就不合乎伪善的传统，就不体面。在这个“仪式”中，有财产的男人是被追逐的对象，但必须扮演追求者，而没有财产的妇女明明紧紧追逐，却必须扮演被动的角色。夏绿蒂与柯林斯牧师结婚没有遵循这个“仪式”，所以不合体统，令人为他们感到难堪。

我们由此便可以理解，在《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班纳特太太要抓住新迁来的彬格莱先生，为什么非要催着自己的丈

① 《傲慢与偏见》第38章。

② 《傲慢与偏见》第28章。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66页。

夫出发先去拜访他不可。按照资产阶级婚姻“仪式”的要求，必须得由一家之主的班纳特先生率先去拜访新来者，待对方做过礼节性的回访后，主妇方可出面设家宴招待客人，而在家宴上，女儿们便露面了。这是促使有财产的单身汉陷入情网的第一步。紧接着便是舞会，喜欢跳舞被视为一个“好兆头”，是“导致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sup>①</sup>这也许是奥斯丁小说里舞会场面多的一个原因吧。总之，通过夏绿蒂的婚姻，通过她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奥斯丁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而且还审视了它的形式方面，即它的“仪式”。在吉英与彬格莱的关系中，吉英虽然默默地爱上了彬格莱，却从不表露，直等到最后彬格莱向她求婚。他们的结合完全合乎“仪式”，是资产阶级“自由选择”、“有爱情”的婚姻的“典范”。

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通过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把资产阶级婚姻从经济实质到礼仪形式揭露得多么透彻啊！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既然，如奥斯丁所表示的，婚姻不过是某种“仪式”底下的利益的权衡，那又怎么解释达西与伊丽莎白的不平等婚姻呢？故事从一开始就在他们两人之间设置障碍，如达西傲慢地拒绝请她跳舞，使伊丽莎白对他产生偏见，达西方面则早就认定她们有那些不体面的亲戚，“倘使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向她求婚！那么他们最后又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也许有必要先谈谈 manners 问题。

英语中 manners 的概念包括许多内容——举止、言谈、礼

① 见本书第 9 章。

貌、风度、待人接物的态度，总之，一个人的文明教养的综合表现，暂且称之为“教养”吧。在当时的社会，“教养”在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八世纪末政治家、思想家勃克曾写过这样的话：“教养（manners）比法律还重要……它们依着自己的性能，或推动道德，或促成道德，或完全毁灭道德。”<sup>①</sup>当时十分流行的所谓“世态小说”就注重从举止言谈，即教养方面描写人物，奥斯丁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世态小说”传统的。譬如，她对人物不做道德伦理的判断，而是多从举止言谈方面刻画。manners一词，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出现竟有一百十三次之多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可以以有无教养来划分。我们从一些不招眼的细节可以体会到奥斯丁在这方面所做的微妙区别。以人们在窗前的表现而言，伊丽莎白在窗口看见达西带着他妹妹乔治安娜来看望她，便赶快“从窗口闪开，生怕被人看见”，<sup>②</sup>在窗前张望对于象伊丽莎白这种所谓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来说，是不合体统的。相比之下，伊丽莎白的姨妈，嫁了镇上的律师的腓力普太太，则打开客厅窗户，大声向过路的熟人叫喊，请人家进屋坐坐。这个细节鲜明地突出了她的缺乏教养，使我们理解了，达西以及彬格莱小姐等人何以认为班纳特一家有这样的亲戚是不配与有身份的人攀亲的。在奥斯丁笔下，举止、言谈、风度、教养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作用的。譬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莱，正是她的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造成的。<sup>③</sup>别的不说，单凭班纳特

① 艾德蒙德·勃克书信《论谋求与法国弑君政权媾和》，见《艾德蒙德·勃克作品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6卷，第150页。

② 见本书第44章。

③ 见本书第286页：“吉英的失望完全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一手造成的”。